

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探討

本論文研究的目的是對含動物詞彙的俄漢諺語進行對比研究，此研究將與許多學科相結合。除了與諺語的相關研究以外，要探討動物詞彙在諺語中使用的情況，還必須討論到國情語言學、文化語言學及跨文化語言學。此外，在討論俄漢語言的異同時，則與對比語言學密不可分。在此章中，將針對與本論文相關之理論與學者做一介紹與討論。其中包含：跨文化語言學－霍爾（E. T. Hall）；國情語言學－科斯托馬羅夫（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韋列夏金（Е. М. Верещагин）；文化語言學－羅常培、申小龍；對比語言學－拉多（R. Lado）；諺語相關研究－維諾格拉多夫（В. В. Винаградов）、尚斯基（Н. М. Шанский）、馬國凡、楊欣安等。

第一節 跨文化交際學、國情語言學與文化語言學

語言與文化的關係向來息息相關，尤其在研究兩種語言相異處的時候，往往都要參考語言背後的文化意義。近五十年以來，有三門密切相關的語言學科被廣泛討論，分別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出現在美國的跨文化交際學、七十年代出現在前蘇聯的國情語言學，以及八十年代出現在中國的文化語言學。這三門學科皆以研究文化與語言之間的關係為主旨，研究的內容大同小異，差別在於側重點不同，但都以提高語言教學質量和有效地進行跨文化交際為目的。在本章節中，將就跨文化交際學、國情語言學與

文化語言學三者來加以進行討論。

當兩種不同的語言進行交際時，會因為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對同一詞語或語句產生不同的理解。為了使交際的雙方之間所具有的知識和概念有所吻合，產生了所謂的“跨文化交際學”。六十年代中期出現在美國的跨文化交際學，側重研究於不同文化之間的交際，且從不同的語言文化對比角度來進行研究。1959年霍爾（E. T. Hall）出版的《無聲的語言》一書標誌著跨文化交際學的建立，對跨文化語言學的研究有很大的影響。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到來的文化全球化，使我們的世界成了一個多元文化並存、互滲和互補的格局。因此，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已成為外語教學與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美國跨文化交際理論的建構始於六十年代，它歷經的變化跟相鄰的學科發展有關。以薩皮爾（Sapir），沃爾夫（B. Whorf）和馬尼諾斯基（Malinowski）為代表的人類學家關於文化與語言的理論，以及亥馬士（Hymes）的交際功能概念、霍爾關於意義與環境關係的論述，都為跨文化交際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八十年代起，跨文化交際研究範圍更加廣泛，內容也更加豐富。¹

國情語言學於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現在前蘇聯，是為了適應對外俄語教學（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ый，簡稱РКИ），讓學習俄語的外國學生能在學習俄語的同時，也能了解所學語言之文化背景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國情語言學（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這一術語最早出現在科斯托馬羅夫（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和韋列夏金（Е. М. Верещагин）合著的《對外俄語教學中的國情語言學問題》（《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ностранцам》）一書中。在此書中，科斯托馬羅夫和韋列夏金對國情語言學下了一個定義：對外俄語教學的一個方面，它為保障教學的交際性，解決普通教育和人文教育之任務，而在語言教學過程中突出語言的載蓄功能，向教學對象進行文化導入（аккультурация）²，其教學法屬語文教學性質，即通過俄語和在學習俄

¹ 韓紅，〈關於建構俄漢對比跨文化交際學的理論構想〉。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1999，（4）。

² 所謂的“文化導入”是指在A文化環境中長大的人獲取B文化要素的過程，其目的是為了讓學生更好地了解俄羅斯文化，包含掌握稱名單位的意義層面所隱含的民族文化義素。

語過程中介紹國情知識。³而通過了這個定義，也明確指出了該教學法的目的是文化導入。國情語言學側重於研究俄語詞語文化，為的是要把語義同文化知識結合起來，其主要的任務就是揭示詞語、句子或語篇中的民族文化語義（национально-культурный компонент⁴）。一九七三年由科斯托馬羅夫和韋列夏金所編寫出版的《語言與文化：作為外語的俄語教學中的國情語言學》（《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是第一本從理論上探討和研究俄語語言國情學問題的專著，這本專著在對外的俄語教學界引起很大的迴響。國情語言學是為了讓學習外語者能夠對所學語言有所認識，並提供文化背景知識。其目的在於排除運用外語時的文化干擾，深入對外語的理解，這有助於當遇見某些詞彙無法從母語中尋得相符合的解釋時，就可以透過國情語言學裡詞彙的背景意義來解釋。本論文中在探討諺語的同時，其背景意義十分重要，因此不能不談國情語言學的概念。

根據韋列夏金的觀點，他認為國情語言學的對象是分析語言並揭示其民族文化語義，且國情語言學是從語言的文化載體功能來研究語言的。因此，“國情語言學”實質上就是“文化語言學”。八十年代中期，文化語言學在中國興起，側重於研究漢語與文化傳統、民族心裡、民族習俗的關係。中國在五十年代初羅常培先生出版了《語言與文化》一書，該書被認為是中國文化語言學的基礎。在一九九零年出版由申小龍撰著的《中國文化語言學》一書，透過漢語研究中國文化，將這門新學科定名為“文化語言學”（又稱“語言文化學”）。

文化語言學把語言和文化聯繫起來進行研究，透過語言研究文化，揭示語言的民族文化內涵。形成此一新學科的基礎是，語言和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密切關係，一方面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而它本身就是文化組成的一個部分；另一方面文化對語言本身的發展和語言行為又有制約的作用。文化語言學只研究具有文化意涵的辭彙，舉例來說，數詞的詞形變化是俄語語法的研究對象，而數詞的選擇性卻具有民族文化特色。如在成語或諺語

³ 楊喜昌，〈論 РКИ 教學中文化導入的直觀性原則〉。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5，第 28 卷（6），頁 59~62。

⁴ 1966 年由 Н.Г.Комлев 首次作為術語正式提出。

中，俄語喜歡用三、七（如諺語：“Кота убить-семь лет ни в чём удачи не видать”，“打死貓，七年都看不見成功”），而漢語則喜歡用三、五、九（如諺語：“三虎出一豹，九狗成一獒”），故屬文化語言學研究的對象。⁵總的來說，可以把文化語言學所涵蓋的範圍簡略概括以下四個方面：1. 語言和文化之間的關係；2. 語言自身所構成的民族文化特色；3. 語言稱名單位；4. 文化對語言的反作用。

從以上三種理論可以得知，不論是美國的跨文化交際學、俄國的國情語言學，或是中國的文化語言學，都在強調文化和語言之間的相關性。學習外語的同時，若不知所學語言的文化背景，很容易會有所誤用，造成彼此之間的誤解。如果說美國的跨文化交際學主要研究交際方法和解決不同的民族交際時可能發生的障礙的話，那麼國情語言學則更側重於研究和揭示存在於語言之中的文化成分和文化模式，而文化語言學則在研究漢語與文化的關係。儘管跨文化交際學、國情語言學和文化語言學這三門學科研究的側重點相異，但基本上都是從文化學和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審視語言，並在廣闊的人類文化背景中來研究語言。⁶唯一較為不同的是，俄國的國情語言學是因應結合文化背景的對外教學而產生的一門學科。任何一種語言的產生、發展與變化，都和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要研究一種語言，必須輔以其文化，才能真正了解這種語言背後的文化涵義。

本論文旨在研究俄漢諺語的差異，要提及差異，就必須先說明一下語言的功能有哪些。在科斯托馬羅夫和韋列夏金所編寫出版的《語言與文化：作為外語的俄語教學中的國情語言學》一書中提到，從國情語言學的角度來看，語言的三大功能有：

1. 交際功能（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

語言是人類用來交際溝通最重要的一種方式，藉著語言來表達所欲傳達的訊息，是人們進行交際的工具。要使說話者與聽話者之間的交際沒有

⁵ 趙善敏，〈關於語言文化學的研究範圍〉，《語言國情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頁 112~118。

⁶ 吳國華，〈語言與文化研究：回顧與前瞻〉。解放軍外國語學院，1997，（5），頁 161~171。

任何障礙，就必須使雙方都擁有相同的經驗和背景知識。在學習外語時，同時也要了解所學外語的文化背景知識，如此才能無誤地使用外語而不會造成聽話者和說話者雙方之間的誤會。

2. 積累功能（又稱文化載蓄功能，кумуля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 / культуруносная функция）：

語言除了傳遞訊息以外，也保存了人類歷史和文化發展的信息，並反應、紀錄、儲存民族文化成果，是民族文化的載體。不同的語言紀錄著不同民族的文化發展，借助文化積累功能，語言才能流傳下來，可以說，語言總是和文化聯繫在一起的。本論文在進行俄漢諺語對比時，語言的積累功能就顯得更為重要。

3. 指示功能（дирек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

這一功能是語言的教育、指導功能，也就是說語言能夠薰陶人、教育人和指導人，在人格形成過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此一功能和文化積累功能相連結，相互之間缺一不可，因為文化積累不僅是單純的儲存，更重要的是要把文化訊息用於言語交際和教育人。譬如諺語“Слово не воробей, вылетит - не поймаешь”（“話語是麻雀，飛出去就抓不著”，近似漢語“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就有警世訓導的作用。⁷

其中，語言的文化載蓄功能對國情語言學的創立和發展尤其重要，因為國情語言學就是從語言的文化載蓄功能角度來研究和學習俄語的。而筆者身為俄語研究者，故以俄國國情語言學的理論為基礎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國情語言學既然是以文化為基礎來進行研究，就必須討論詞的民族文化因素。在國情語言學的詞彙理論當中，科斯托馬羅夫和韋列夏金將帶有民族文化義素的詞分為三類：不等值詞（又稱不對應詞，безэквивалентные слова）、部分等值詞（又稱背景詞，неполноэквивалентные слова / фоновые

⁷ 季元龍 編，《俄語語言國情學——教與學探索》。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頁 20~21，57。

слова) 和完全等值詞 (эквивалентные слова):

1. 不等值詞：指的是兩種語言之間無相對應且無法翻譯的詞彙，如俄語中的“матрёшка”（套娃）、漢語中的“豆腐”等。這些非等值詞雖然在另外一種語言中可以用相近的詞彙來解釋其意，但仍然無法找到準確的概念。即使可以將 матрёшка 譯成“套娃”，但非俄羅斯民族的人還是不知其為何物。
2. 部分等值詞：這類詞指的是兩種語言中都有相同概念的詞彙，但其意義卻大不相同。如在中國和俄國都有“龍”的傳說，龍在中國是權力和吉祥的象徵，古代多用來形容皇帝。但俄語中的“дракон”則是怪物的一種，象徵著殘忍和無情。而在中國人看來，貓頭鷹是一種不祥之鳥，俗名夜貓子，所以會有“夜貓子近宅，無事不來”這句諺語。但俄國人卻認為 сова（貓頭鷹）是智慧的象徵。
3. 完全等值詞：指的是兩種語言具有相同概念和意義的詞，多屬科技、學術類詞彙。例如俄語裡的“компьютер”和漢語的“電腦”、“мышка”和“滑鼠”，都具有相同的概念和意義。

部分等值詞彙與文化的關係密不可分，故將是本論文研究的重點所在。然而須特別說明的是，如俄語中的 идти 只指一次性的“去”，漢語裡的“去”卻不一定只有一次性。這類詞雖然也屬於部分等值詞，但因本論文採國情語言學的角度來討論，故此類不含詞彙背景及文化因素的詞彙將不在討論的範圍裡。

這三種帶有民族文化義素的詞當中，最能體現俄國文化就是“無等值詞”。然而其數量只佔了現代俄語詞彙量的百分之九而已，要掌握它們並不難，因此並沒有太大的研究前景。但比較有研究前途的卻是“部分等值詞”，因為這類詞數量眾多，同樣的俄語詞彙由不同國家的人來學習，會因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而產生不同的“異文化干擾”。⁸而這樣的干擾則可

⁸ 俞約法，〈語言國情學及其背景——從語言及文化的背景看蘇聯的文化語言學〉，《語言國情學》。吳國華、楊仕章 編，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頁 86。

從文化語用學的角度來看。就文化語用學而言，缺乏必要的知識儲備和文化儲備都可能導致言語行為文化遷移現象的發生。所謂的“文化遷移”，是相對於母語文化而言的，指在習得目的語或跨文化交際過程中借助於母語及母語文化的習慣來思維和表達的現象，這種習慣其實就是語言文化使然。⁹

至於伴隨意義（**коннотация**）是詞的感情色彩，任何一種語言的背後都有著潛在受民族文化制約的附加意義，在此可以將伴隨意義分為文化伴隨意義及修辭伴隨意義。文化伴隨意義反映的是全體或大多數社會成員對某一事物的態度，而非某一個人或少數成員的個人意識，且有助於文學作品中美學功能的實現。¹⁰研究此類具有詞彙背景及含有民族文化語義的部分等值詞將是本論文所要探討的重點所在，將在第三章做更為深入的研究。

無論是跨文化交際學、國情語言學，還是文化語言學，在在強調了語言和文化之間的關係。語言和文化是一體兩面的，要學好一種外語，一定要對所學外語的文化有所了解，才能正確無誤地使用外語。再者，現在國際間的交流日益重要，在交際過程中會因為各方面的差異而使交際行為產生障礙，若能對彼此之間的文化背景有所程度的理解，將可減少交際時所產生的錯誤。藉著了解文化背景，使所學外語能成為自己的另一個母語，是此三種理論所欲達成的任務之一。筆者身為俄語研究者，故在研究俄漢諺語對比時主要引用俄國國情語言學的理论概念，跨文化語言學及文化語言學則次之。

第二節 對比語言學

⁹ 趙愛國，〈俄漢語言交際中的文化遷移－文化語用學視角中的俄漢言語交際行為淺議〉。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5，（1）。

¹⁰ 吳國華，〈析談俄語詞的文化伴隨意義特點〉，《語言國情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頁 144~147。

俄國學者烏申斯基（К. Д. Ушинский）曾經說過：「比較是所有認識和思維的基礎。我們透過比較來認識世界上的事物，而非利用其他的方法。」¹¹比較是人類認識事物、研究事物的一種方法，也是語言學研究的一種基本方法。按其本質上來說，對比語言學也是一種比較，不過是一種具有特定含義的語言學中的比較。¹²對比語言學在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在美國蓬勃發展。傳統語言學中，「比較語言學」指的是歷史比較語言學（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由歷史的角度建構語言的譜系。而這一門新興學科稱為「對比語言學」（contrastive linguistics，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контрастив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對比語言學是二十世紀後半葉語言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是對比語言學的創始人，而他也是語言研究中最先使用“對比”這一術語的人。他認為語言比較研究如果要成為獨立的學科，提出自己的目標和宗旨，那麼它只能是用來深入持久地探討語言，探討民族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此外，他也特別強調要研究語言與民族個性間的相互關係。¹³而我們通常把拉多（R. Lado）的《跨文化語言學》（1957）看成是對比研究的一個轉折點，但“對比語言學”這個名稱則是由美國語言學家沃爾夫（B. L. Whorf）在1941年首先提出使用的。對比語言學是語言對比研究這一語言學分支的一個總稱，它包括理論和應用兩部分。¹⁴

對比語言學是語言學中的一個分支，比較方法是對比語言學的基本方法，它的根本任務是對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進行共時的對比研究和對比描寫，堅持共時原則，描述它們之間的異同。所謂對比，重心在“比”字上。“對”是並列、比照，“比”指比較、分析。藉著共同點的研究，找出不同的地方，因為這些差別才是學習困難的主要根源，並藉此來揭示兩

¹¹ Ушинский К. Д. <<Избранные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 М., 1979, т.3, с.436.

¹² 許余龍 編著，《對比語言學蓋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頁1。

¹³ 潘文國，〈對比語言學的目標與範圍〉。外語與外語教學，2006，（1），頁121~128。

¹⁴ 見註12，頁20~21。

種語言各自的特點，將這類研究應用於其他有關領域。但現在的研究也開始注重相同點，而不再只重兩種語言之間的不同處，故本論文將採異同並重的方式來進行討論。¹⁵而依據不同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對比語言學又有語音對比、詞彙對比、語法對比、篇章對比、語用對比等不同的對比研究。

和其他學科一樣，對比語言學的分類也包含了理論和應用兩方面，分為「理論對比語言學」和「應用對比語言學」。理論對比語言學的任務是探討對比研究的合理模式理論框架，深入分析和描述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之間的異同，從而確定語言之間的等同、相仿和對應等概念。應用對比語言學的目的是將理論對比語言學的研究成果運用到外語教學和對外語言教學、翻譯、雙語辭典編纂等與所對比語言相關的活動中去。而對比語言學最主要的應用領域就是外語教學，特別是對於兩種語言的翻譯理論與實踐，更具有直接的應用價值。¹⁶

既然對比語言學是對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進行比較，在研究對比之前，必須考慮到語言的可比性。無論是哪種語言都是人們表達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因此不同語言之間無疑是可以比較的。一般認為，將一種語言和另一種語言作整體上的比較是不切實際的，一項具體的對比研究就是在兩個語言系統中選擇一部分來加以比較。因此，當我們在進行兩種語言的比較時，就必須考慮到所選出來的部分是可以比較，而且所做的比較也是有意義的。而要確定對比是否具有共同基礎，首先需要將所對比的東西加以分類，看看他們是否屬於同一類，分類分得越細，可比性就越高。¹⁷

考慮了語言的對比性以後，對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進行對比時，可以有單向和雙向（甚至是多向）對比。所謂“單向對比”，就是由語言 A 出發，以語言 B 為參照物，研究語言 A 的某種範疇、某種形式、某種意義在語言 B 中有什麼等值物，以及如何表達。換言之，即以一種語言為出發語（ИСХОДНЫЙ ЯЗЫК），另一種語言為目的語（ЯЗЫК-ЦЕЛЬ）。“雙向對比”是以某種範疇為基點，進行兩種語言的平行對比，沒有出發語和目的語的

¹⁵ 見註 12，頁 4~7。

¹⁶ 見註 12，頁 11，15~16

¹⁷ 見註 12，頁 25~26

區別。而要選擇哪種語言作為出發語，完全取決於對比的目的與任務，而不是取決於語言的特點或所採用的方法。¹⁸為外語教學服務的應用對比一般都是單向對比，藉著母語和外語的比較來掌握外語，是最好的方法之一。在本論文裡，將採單向對比的方式進行研究。

除了上述兩種單雙向對比以外，對比語言學以共時對比作為研究的基礎時，還有兩種基本做法：「從形式到內容」和「從內容到形式」。「從內容到形式」是指對比的範疇具有語義性，目的是以同一個語義群為基礎，對比其內部關係，進而討論其表達手段。「從形式到內容」則指對比的範疇具有形式性，概括一定的形式手段，簡單來說，即藉著語言的外在表現，來探索語言的內在文化。¹⁹

語言與文化的聯繫對於對比語言學具有很重要的意義。語言間出現的差異除了有語言文字本身結構上、類型上的原因以外，還有文化上的因素，也就是各民族之間生活環境、生活方式、民俗等各個方面的原因。客觀上來說，語言現象是極其豐富且複雜的，當把兩種語言拿來對比的時候，可以感到接觸的語言現象就更為複雜。²⁰

按照沃爾夫的意見來說，兩者或兩者以上的語言差別愈大的時候，這一研究就愈有實際意義，提出的問題就會越尖銳、越富挑戰性，得出的結論也就越會有理論和應用的價值。因此以漢語和外語作對比，比以印歐語之間作對比要有利得多。²¹而中國的俄語和漢語的對比研究，是開始於五十年代，七十年代以來越見發展。文化對比可以透過拉多在《跨文化語言學》一書中所提出的「形式(form)－意義(meaning)－分布(distribution)」

¹⁸ 張會森 主編，《俄漢語對比研究》(上卷)。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頁6~14。

¹⁹ 張會森，〈對比語言學問題〉。《對比語言學論文集》(王福祥編)。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2年，頁24。

²⁰ 見註18，頁29~30。

²¹ 潘文國，〈語言對比·語言特點·語言教學〉。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2006，第4卷(1)，頁1~5。

三個層次來進行。²²形式、意義、分布三者的關係又可以分成：

- (1) 同一形式，不同意義：如漢語中“喜鵲”常用來表示喜事，但俄語中的“сорока”（喜鵲）卻是指為人嘮叨多話。所以俄語諺語中“Сорока на хвосте принесла”（“喜鵲在尾巴上帶來的”，意謂“天上掉下來的”）卻不似漢語中指的是帶來喜事，反而是指未經確認的傳聞。
- (2) 同一意義，不同形式：如俄語裡“аист”（鸛）象徵會送來孩子的鳥；漢語裡並不會將鸛視為送子鳥，漢文化裡會送子的動物是麒麟。鸛和麒麟都代表送子鳥，但卻用不同的形式來表現。
- (3) 同一形式，同一意義，不同分布：分布又分時間分布和空間分部。時間分布指的是過去常用的意義，但現在少用了。如古代中國會用“呆頭鵝”來形容腦筋遲鈍的人，但現在卻較常用“豬”或“牛”來形容人的愚昧；空間分布則是指在不同的場合所使用的詞也不同。如俄語裡“конь”和“лошадь”都表示“馬”的意思，但“конь”多用於軍語（боевой конь—戰馬）或童話、神話中，“лошадь”則多指一般口語裡的馬（рабочая лошадь—勞作的馬）。

另外，本論文旨在對俄漢語進行對比，而俄漢語對比研究有則有四種模式：²³

- (1) 結構對比模式（структурное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е）：也稱形式對比，即靜態的語言分析。它專注於語言的符號形式，旨在揭示語言的普遍語法和語言規則。
- (2) 功能對比模式（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е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е）：側重用法對比，

²² R. Lado,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 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Teacher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 p. 114-120.

²³ 袁順芝,〈論俄漢語對比研究的模式和方法〉。外國語言文學：外語研究, 2005, (6), 頁 50~53。

即言語分析和交際功能對比。屬動態研究，包含語言單位的功能（функция）和言語運用的功能（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е），而言語運用功能則是重心。

（3）語用對比模式（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е）：或稱功能－結構對比。語用起源於功能，重在交際策略和語用含義。

（4）跨文化對比模式（межкультурное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е）：或稱語言文化對比模式（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ое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е），以語言中文化因素的對比和影響語言表達的語言外文化因素的對比為重點。本論文在探討俄漢語中有關動物之諺語所表現的差異性時，必須考慮到背後的文化因素，故此點將為論文中所採用的對比模式。

本論文藉由俄漢諺語的對比，使俄語的特色能更清楚地被認識，所使用的對比方法將採用單向對比方法。在第二章第三節探討俄漢諺語的定義、第三章諺語的來源及第四章諺語結構之對比時將採用單向對比，探討兩者的諺語來源各有何種差異；而第五章含動物詞彙俄漢諺語之文化意涵，以俄語出發進行俄漢語比較，亦採用單向對比，即探討動物詞彙在俄漢諺語中使用的異同而產生的意義變化有何不同。此外，本論文所欲探討的是語言和文化之間的關係，故將著重在「意義」和「形式」的比較上，「分布」對比次之。

第三節 諺語之相關研究

俄語有一句古諺“Пословица вовек не сломится”（“諺語永遠不會

被折斷”，意謂“諺語永遠都不會失去生命力”）。諺語的出現古來有之，並被視為人類生活和智慧的結晶，在各民族當中都佔有重要的文化地位。不同民族在諺語的表達上會以不同的方式來表現，對諺語的定義也不盡相同，甚至同一民族的諺語，不同的學者也會對諺語提出不同的定義。每一句諺語都有著其背後代表的文化意涵，更可以說，諺語在語言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使語言變得更加豐富。要研究俄、漢諺語的差異之前，必須先針對俄、漢諺語的定義和範疇等方面進行討論。如此才能為兩者的異同奠定基本的基礎，也才能對兩種語言進行對比。本節中將逐一介紹俄、漢學者對成語和諺語的區別及對諺語的定義，並將俄漢諺語在定義上的異同做一比較。

壹、俄語諺語之定義

在俄語學界對諺語的範疇有著不同的看法，有的學者認為諺語是成語的一種，但也有學者持否定看法。俄羅斯成語學家莫洛特科夫（А. И. Молотков）曾經指出：“在俄語學界，對於什麼是成語，或者什麼是語言的成語性單位（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единица языка）這一問題，尚未有一個統一的共識，所以對成語所包括的範圍也就沒有一致的觀點”。²⁴因此要談諺語的定義之前，必須先提及諺語和成語之間的關係。俄語“фразеология”（成語）一詞是源自希臘語 phrasis 和 logos，在 18 世紀時從法語移入俄語。根據維諾格拉多夫（В. В. Винаградов）在 1977 年〈論俄語成語的基本類型〉（〈Об основных типах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единиц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一文中，依據語義融合性將成語分成三類：²⁵

1. 融合性成語（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сращение）：此類成語在語意上的結合度最強，結構上不可分割，詞彙也不能替換，成為一個固定詞組。如：“собаку съел”（на чём-нибудь）（“把狗吃了”，意謂“對某事很拿

²⁴ Молотков А. И.,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осква, 1968, с. 5.

²⁵ Винаградов В. В., <<Об основных типах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единиц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Москва, 1977, с. 140-161.

手”)。

2.綜合性成語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единство)：和融合性成語一樣，句子的成分固定，但是在某種程度上還是符合現代的語法規則。詞組中可以增加其他的詞，詞序也可以做些微的變動。如：“белая ворона” (“白色烏鴉”，意謂“特立獨行的人”)。

3.組合性成語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сочетание)：此類的成語語意的結合度最弱，可以用另一個同義詞來代替詞組中的某一個詞。其文法形式和文法關係符合現代文法，可以依據現代文法來代換，但仍具原有的句法成分。例如：“сесть в лужу” (“坐在一灘水上”) 也可以用“сесть в калошу” (“坐在套鞋上”) 來表示，都是表示“出洋相”之意。

就維諾格拉多夫的分類來看，成語是以詞組的方式來表達。除了以上維諾格拉多夫的分類之外，尙斯基 (Н. М. Шанский) 還提出了“聯合性成語”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выражение)。²⁶聯合性成語的特性是具有轉義，包含了名言 (крылатые слова)、諺語 (пословицы)、俗語 (поговорки) 等。支持尙斯基理論的學者，還包括布拉霍夫斯 (Л. А. Булоховский) 及列福爾馬次基 (А. И.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另外，奧日科夫 (С. И. Ожегов) 將成語分為廣義和狹義兩部分：廣義成語的部分除了維諾格拉多夫所提的三類成語以外，還包含了諺語、俗語和名言等類，此觀點與尙斯基的理論相近；而奧日科夫所謂的狹義成語則近似於維諾格拉多夫的理論，將成語分成三類。奧日科夫這種對廣義及狹義的概念對日後俄語成語的研究影響也很大。²⁷

但基於論文的研究方向，諺語是否屬於成語之從屬問題並非本論文研究的主題，故在本論文中並不加以討論。因此，在本論文裡將採取維諾格拉多夫和奧日科夫對成語狹義的看法，將諺語視為完整句子，而成語則僅

²⁶ Шанский Н. М., <<Лексиколг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осква, 1972, с.203~204.

²⁷ 見註 18, (下卷), 頁 198。

爲一詞組。²⁸

另外，最易令人混淆的“諺語”（*пословица*）和“俗語”（*поговорка*），俄羅斯學者也有不同的觀點。根據《語言學百科辭典》（《*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1990）和茹科夫（*В. П. Жуков*）所編的《俄語諺語俗語辭典》（《*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их пословиц и поговорок*》），以及波鐵布尼亞（*А. А. Потебня*）和詩洛克娃（*О. С. Широкова*）等學者從語義上來區分諺語和俗語的觀點來看，皆認爲諺語具有字面意義和轉義，或只有轉義（如：“*С собакой ляжешь, с блохами встанешь*”，“與狗躺在一起難免會沾到跳蚤”，近似漢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句諺語僅能從轉義來了解）；而俗語是指常帶有教育意義、且只有字面意義的完整語句（如：“*Кончил дело - гуляй смело*”只有直義爲“工作做完了，痛痛快快去玩吧”）。而《語言學百科辭典》還提出俗語在結構上的特點，俗語以泛指人稱句和動詞不定式句表現（例如：“*Волка бояться - в лес не ходить*”，害怕狼就不要進森林，意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的則以帶“нет”的無人稱句表示（例如：“*Нет дыму без огня*”，“沒有火就不會有煙”，近似漢語“無風不起浪”）。²⁹從以上學者們對諺語和俗語的區分中可以看出，俗語比諺語更通俗易懂，其內涵側重於形象化；而諺語節奏鮮明，其內涵側重於理性化，表達比俗語更深刻。

30

儘管以上的學者對諺語和俗語有所區分，但仍有學者持相反看法。在費利次娜（*В. П. Фелицына*）和普拉霍洛（*Ю. Е. Прохоров*）所編的《俄語諺語、俗語、名言錦句語言國情詞典》（《*Русские пословицы, поговорки и крылатые выражения*》）中就不區別兩者。³¹此外，在實際運用上，諺語和俗語之間的界線仍有些模糊，常有互相使用而不刻意區分的情況在，

²⁸ 這樣的區分並不完全，因爲諺語也不只是句子性的，亦有詞組性的諺語，如“*Брать быка за рога*”（鬥牛時要握住牛角，表抓住要害，近似漢語“擒賊先擒王”）。但必須特別說明的是，這類詞組性諺語易與成語相混，區分不明，故在本論文所參考的字典資料中將不採用這類諺語。

²⁹ Ярцева В. Н.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90.

³⁰ 吳芳，〈俄漢熟語概念的對比分析〉。中國俄語教學，2006，第25卷（1），頁32~35。

³¹ 丁昕，〈俄語成語研究〉。北京：軍事誼文出版社，2001，頁17~18。

這點從字典上的使用可以看出。如“Седина в бороду, а бес в ребро”（“鬚髮已白，而熱情如火”，意指“人老心不老”）《俄語詳解辭典》（《Большой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С. А. Кузнецов，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1）註為諺語，而《俄漢大辭典》（2003）則註為俗語³²。另外，“Насильно мил не будешь”（“不能強迫別人喜歡你”，近似漢語“強扭的瓜不甜”）和“В тесноте, да не в обиде”（“寧願忍受擁擠，也不要受氣”）兩句在雅爾次娃的《大百科字典》裡註為俗語，但在奧日科夫的《俄語詳解字典》（《Толково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中則列為諺語。

由此可知，俄國人對於諺語和俗語一直無法做一個很完整的區別，在書寫或交談中也不特別講究是諺語還是俗語，甚至混為一談來使用。俗語雖然有詞組形式，但大多數仍為一完整句子，與諺語相同。在對諺語和俗語區隔不明的情況之下，本論文中將不把諺語及俗語予以明確的區分，並視為一體來做討論。

另外，我們還必須談諺語和格言（афоризм）之間的關係。格言與諺語最大的差別在於格言是出於名人之口，可以找出其確切的說話者，多用在書面中；而諺語多為民間創作，大多無法得知其來源。但在俄語中還有一種特殊的情況是有的格言會因為廣泛使用而變成諺語。茹科夫認為：“並非所有的格言都可以成為諺語，而是要被多數人認同、使用，具有生活形象，才能被流傳下來”。³³如“Лучше меньше, да лучше”（“寧肯少些，但要好些”，意謂“寧缺勿濫，寧少求精”）是列寧在一九二三年寫的一篇論文標題，列寧用這句話來表示做任何工作都要十分注意質量，不要貪多“Революции - локомотивы истории”（“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是馬克斯的名言，他用火車頭來比喻革命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Нет (в мире) таких крепостей, которых большевики не могли бы взять”（“世界上沒有布爾什維克攻不下的堡壘”）是出自史達林的演說，用以鼓勵工農出身的共產黨員；而馬克思的“Религия - опиум народа”（“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句名言揭露了宗教對人民精神和思想上的腐蝕及麻醉作用。這

³² 見註 29。

³³ Жуков В. П.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их пословиц и поговорок>>. Москва, 1991, с.6.

一類格言也是諺語的一種。在本論中所採用由格言演變而來的諺語以編入諺語辭典的例子爲主要參考來源。

縱上所述，我們可以將俄語諺語的定義和內容最一總結。費利次娜（В. П. Фелицына）和普拉霍洛夫（Ю. Е. Прохоров）認爲，和民間風俗有關的簡短語句稱爲諺語和俗語，諺語表現了人類和事物的本質，並給予評價或對行爲方法予以規範。³⁴《俄語詳解辭典》裡對諺語的定義是：諺語概括了生活的不同現象，且通常具有教訓意義。³⁵根據 1973 年由科斯托馬羅夫和韋列夏金所編寫出版的《語言與文化：作爲外語的俄語教學中的國情語言學》一書中提到的：諺語和俗語指的是一種口頭上簡短的名言，爲所有人知道，不是說話者臨時創造出來，而是從經驗和記憶中獲得的語句。諺語可以表示人或事物的本質，並給予評價，是民族智慧的結晶；而俗語則可以幫助情感的表達和增加語言的豐富性。³⁶此外，根據他們的觀點，諺語通常是完整的句子，所指的是事物或現象的整體，與只指出個別事物或現象的成語大不相同。再者，諺語通常表示判斷，是整體的運用，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

貳、漢語諺語之定義

漢語裡，對諺語的範疇較俄語清楚，而學者對諺語及成語的區別在觀點上也較爲一致。漢語中，“成語”這一個概念的形成也有一個過程。周秦漢時期，它被稱爲“語”或“諺”，“鄙語”或“鄙諺”。發展到現在漢語，“語”的概念又分化爲“成語”、“慣用語”、“諺語”等新的類別。根據薛誠之在《諺語的探討》一文中所敘述的，成語除了形容作用外，不包含經驗，而諺語則相反。³⁷而學者楊欣安在《成語和諺語的區別》(1961)

³⁴ Фелицына В. П., Прохоров Ю. Е. <<Русские пословицы, поговорки и крылатые выражения>>. Москва, 1988, с.7~8.

³⁵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Кузнецов С. А. <<Большой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1.

³⁶ Костомаров В.Г., Верещагин Е.М.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Москва, 1973, с.88~89.

³⁷ 該文發表於 1936 年北平禹貢學會的《禹貢》(半月刊)第 2 期中。

兩者的區別有以下幾點：³⁸

- (1) 口頭用語和書面用語的不同：諺語是流傳在人民群眾口頭上的語言，而成語多用在書面語言上。且因為諺語是口頭語言形式，故具有明顯的地區性；而書面語則較為統一。
- (2) 表達的內容不同：成語表達一種客觀概念、一種客觀現象；而諺語表示判斷和推理，反映出一種經驗。
- (3) 使用的方式不同：成語在句子中當詞來使用，可以充當各種句子的成分，不能獨立存在；而諺語一般是個獨立的句子，不做句子成分，大多數拿來印證自己所講的道理。

朱介凡先生則認為，成語的性質是辭義簡古，不全有口語性。它和諺語還有另一差別是，有些成語只是一個詞組，並非成句，但諺語必須是個句子。此外，唐松波在《熟語和成語的種屬關係》(1960)一文裡提出成語和諺語的另一個不同處，在於諺語概括地說出一個客觀的真理或者一種思想；而成語僅表示一種客觀現象、人或事物的特點及狀態等。成語和諺語的不同點在於：(1) 成語書面性強，諺語口語性強；(2) 成語比諺語的結構更為定型化；(3) 成語多表示一般概念，諺語多判斷和推理。伍占坤和馬國凡合著的《諺語》(1980)一書中也提到了兩者的差異：在形式上，成語以四言組合為基本形式，諺語則以“對聯式”的韻語和短句為基本形式。另外，在造句功能上，諺語往往充當複句的分句或獨立成句，而成語多數是詞組，因此極少獨立成句。成語定型性極強，結構成分不能任意代替，也不能刪減或改變結構關係，而諺語則可以些微變動，同義形式較多。在歷史來源上，成語的形成和知識份子有關，可以從古書上找到來源；而諺語來源於人民口語，很少能找到書面的來源或出處。³⁹

漢語裡的“成語”和“諺語”較俄語容易分別。從以上幾位學者所提出

³⁸ 溫端政 周薦，《二十世紀中國語言學叢書—二十世紀的漢語俗語研究》。山西：書海出版社，2000，頁 71~72。

³⁹ 見註 38，頁 81~82

的概念可以得知，成語短小精幹，多為四字，是一種定型語、一種詞組，傾向用於書面，且多出自於古代，可以考究其根源。而諺語則為一個完整的句子，可以獨立存在，其來源大多無法考據，是流傳在人民之中，所以較為口語。因此可以藉著這幾點輕易地將諺語和成語區分開來。而漢語對於格言的定義基本上和俄語相同，皆認為可以找出確切來源，且書面語是格言最大的特點，並以此來區別諺語和格言的差異。但也有漢學家提出格言會轉變成諺語的觀點，如任訪秋認為諺語與格言是相通的，假如格言完全地普遍化以後，也可以說它是諺語。⁴⁰在本論文中對於這類格言轉化而來的諺語也同俄語諺語一樣，以列入漢語諺語辭典中的例子為主要參考來源。

至於俗語和諺語的區別，漢語同俄語一樣都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界線，兩者往往不予以區隔，使用上也不刻意強調是諺語或俗語。在此必須先討論一下何謂“俗語”。一九七九年的《辭海》裡把俗語解釋為：流行於民間的通俗語句，帶有一定的方言性。而根據溫端政的看法，把俗語定義為：漢語語彙裡為群眾所創造、在群眾口語中流傳，具有口語性和通俗性的語言單位。按照這種定義，俗語首先應包括諺語。⁴¹《現代漢語詞典》對俗語的解釋是：通俗並廣泛流行的定型語句，簡練而形象化，大多數是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反應人民生活經驗和願望。《漢語大詞典》認為俗語是：民間流傳的說法、通俗流行並以定型的語句、方言土語、指當地的習慣用法。⁴²而諺語和俗語的關係，就溫端政認為，諺語和俗語有三個相同的基本特點：為人民所創造、所使用、具有廣泛的群眾性；語句簡單凝練，在結構上具有相對的固定性；流傳在群眾的口頭上，具有鮮明的口語性。《禮記·大學》的釋文裡，認為“諺，俗語也。”《左傳·隱公十一年》裡對諺語的釋文為：“諺，俗言也。”表明“諺”和“俗語”是同義名稱。由此可知，諺語和俗語都由民眾所創造，富有地方特色，反映語言特點，表現出地方文化。兩者不但相同性大，界線也不明，故在本論文裡並不區別諺語和俗語的差別，並將兩者視為一體進行討論。

⁴⁰ 任訪秋，〈諺語之研究〉。禮俗（半月刊），1931，第6—7期合刊

⁴¹ 溫端政，〈俗語的性質、範圍和分類〉，溫端政 主編，《俗語研究與探索》。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8~13。

⁴² 見註41，吳建生，〈萬榮俗語初探〉，頁201。

總結以上討論可知，某些觀點對於成語和諺語最常被使用的區別法，就是認為四字的多數是成語，五字和五字以上的則稱為諺語。這樣的分法是從形式上把成語限定在四字格裡，而不考慮它的內容和性質。至於諺語在形式上被認為是五字或以上，內容上則具有教育和警戒功能。例如“唇亡齒寒”就形式上來說是屬於四字格，即使在內容上是生活經驗的總結，並含有教育及警戒意義，仍將之歸類為成語。但如果不從形式上來區分，僅從內容上來看是很難區別為成語或諺語。更可以說，這類詞語是兼跨成語和諺語兩類的。但為求研究方便，在本論文當中採一般漢語學者的觀點，即認為四字為成語，五字及五字以上為諺語。至於最易與諺語相混的俗語又有什麼特性呢？朱介凡先生認為俗語要有五種性質：一、通俗的。二、風俗的。三、土俗的、四、行俗的。五、流俗的特稱語。按俗語在構成要件中除了品味較低外，其他與諺語無異，如“狗嘴裡吐不出象牙”。⁴³

至於中國的學者對於諺語的定義又有哪些看法呢？郭紹虞在將諺語的定義概括為：“諺語是人的實際經驗之結果，而用美的言詞以表現者，在日常談話可以公然使用，而規定人的行為之語言”。⁴⁴杜同力在給諺語的定義則為：“諺語是民間流行的格言，或由經驗得來的定論，借以互相告誡的話”。⁴⁵任訪秋認為：“諺語是一般人相傳的話。其中含有教訓的意味，有的也可以說是世俗所公認的有價值的格言”。⁴⁶薛誠之在〈諺語的探討〉（1936）一文中則認為：“諺語是人類於各時代所積累下來的實際觀察以及日常經驗的成果，為了便於保存和傳達”。這些學者除了強調諺語的經驗性和訓誡性以外，還指出諺語具有民間性和世俗性。朱澤吉〈論民間諺語所表現的階級意識與社會風貌〉（1957）裡認為：諺語是廣大人民群眾智慧與經驗所凝成的作品，包含及其複雜且多樣的精神狀態和生活現象。

另外，王毅〈略論中國諺語〉（1961）裡，認為諺語是民間文學的一種形式，是一種口頭創作，產生於民間，流傳於人民中，本身常含有一種

⁴³ 周盤林，《中西諺語比較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 63，頁 7。

⁴⁴ 郭紹虞，〈諺語的研究〉。小說月報，1921，第 2 卷第 2、3、4 期。

⁴⁵ 杜同力，〈諺語之研究〉。國語週刊，1925，（9）。

⁴⁶ 見註 38，頁 46。

教訓意義。另外，他更提出諺語是一種群眾的集體創作。伍占坤和馬國凡認為諺語是通俗簡練、生動活潑的韻語或短句，經常以口語的形式在人們間廣泛地沿用和流傳，是人民群眾表現實際生活經驗或感受的一種現成話。⁴⁷王勤根據諺語的特性，給諺語下的定義是：“諺語是人民群眾生活鬥爭的經驗總結，具有傳授經驗和教訓勸戒功能，流傳於人民群眾口語中的現成話。”⁴⁸寧矩認為“凡是為增強語言效果而把屢試不爽的生活經驗總結出來，用以喻事明理，並在用詞上較為定型的直語常言，就叫做諺語”。⁴⁹段平在〈諺語及其藝術特色〉（1980）一文裡，則認為“諺語是反映人民群眾生產鬥爭、社會鬥爭和日常生活的一種短小精悍的口頭文學”。而由中國民間文學及成全國編輯委員會署名的《中國諺語集成·總序》（1990）給諺語下了這樣的定義：“諺語是民間集體創作、廣為口傳、言簡意賅並較為定型的藝術語句，是民眾豐富智慧和普遍經驗的規律性總結”。⁵⁰

縱上所述，漢語學者裡對諺語的定義雖然不完全一致，但大多都認為諺語為民間創作，於口頭上流傳，富有教訓意義，且是人民生活經驗的總結，以傳授經驗為目的。從上述討論的過程中也可得知，漢語裡對諺語和成語的區別有較為明確的方式及觀點，而對諺語和俗語則多視為一體。因此在研究漢語諺語時，較不易造成研究上的困難，而漢語一般對諺語、俗語、成語之間的關係，也將為本論文所採取的研究方式。

參、俄漢諺語定義之異同

從以上兩國學者對諺語的定義來看，可以將俄、漢語諺語的共同點整理如下：

(1) 認為諺語是一完整的句子，可獨立存在。

⁴⁷ 伍占坤、馬國凡，《諺語》。蒙古：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頁3。

⁴⁸ 王勤，《諺語歇後語概論》。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頁8。

⁴⁹ 寧矩，《諺語·格言·歇後語》。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頁24。

⁵⁰ 同註41，溫端政，〈諺語的性質、範圍和分類〉，頁17。

- (2) 表達一定思想，多具有教育和規範意義，並給予評價。
- (3) 大多源自民間，是人民經驗的累積、智慧的結晶，更是一種集體的創作。作者不明，只有少部分可以從書面作品中找到出處。
- (4) 除了表面意義以外，皆有其背後的隱含意義（коннотация）。
- (5) 都是用來強調或證明自己所說的話，具修飾功能。

從這五點可以得知，俄漢諺語之間的相同性很高，僅有少部分的不同。如上所述，在漢語裡對於區分成語及諺語較俄語為易，對所屬的範疇也較為清楚。而在俄語中，俄國學者對於成語和諺語是否屬於同一類一直有許多的爭議，相較於漢語，爭議性相對較俄語少。

此外，透過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俄漢語對於諺語的定義大致上相同，皆認為是一個完整的句子、表達一定的思想，且是在民間流傳，故較口語化。但俄國學者對於諺語是否屬於成語的一部分仍有意見上的分歧。相較於俄語，漢語雖然也有一派持諺語屬成語一部分，然而大部分的人仍將之區分開來。本論文所採取的是維諾格拉多夫和楊欣安等人的觀點，將成語和諺語區隔開來，但不區別諺語和俗語的差異。

諺語是蘊藏各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寶庫。透過諺語，更可以清楚地認識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色，進而了解民族的特性，學習前人的智慧和經驗，以及人類的發展進步。如果學習一種外語只學習了字彙及文法，而沒有學習最具文化意涵的成語或諺語，那麼只是掌握了語言的軀殼，尚未習得語言的靈魂。而這也是為什麼本論文會選擇諺語來作為研究的原因之一。另外，由上述異同的說明可以得知，俄漢諺語在形式和定義等方面的相同度高，相對來說可比性就越高，也更有研究的價值。透過此節對俄漢諺語的定義、特性及價值有了第一步的認知以後，將有利於對之後論文研究的分析及探討。

透過以上對跨文化語言學、國情語言學、文化語言學、對比語言學及諺語相關理論的討論之後，在本章最後做一總結：

1. 不論是產生於美國的跨文化語言學，還是俄國的國情語言學，或是中國的文化語言學，都是研究文化與語言之間的關係。這說明了文化與語言已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在研究語言的同時，勢必要考慮到文化的因素。
2. 透過對比語言學對俄、漢諺語進行對比，可以知道兩國對諺語的定義基本上是相同以外，更可藉此對俄漢兩國的文化背景差異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3. 俄語對諺語和成語是否屬於同一範疇有不同的見解，漢語則對諺語和成語有明顯的區隔，認為兩者獨立，互不從屬。而不論是俄語或漢語，在諺語和俗語之間的區別上並不明顯，兩者相同性高。
4. 俄、漢語對諺語的定義大致相同，皆認為是一完整句子，表達一定思想，具有教育和勸戒的功能，可以獨立存在使用。

另外，根據本章所介紹的多項理論，在此將本論文中所採取的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1. 美國的跨文化語言學、俄國的國情語言學及中國的文化語言學三者，雖然彼此各有側重，但都在強調語言與文化密不可分的關係。但因筆者為俄語研究者，故本論文將採取國情語言學的觀點與術語。
2. 在語言的三大功能方面：交際功能、積累功能、指示功能中，本論文將以積累功能為主要探討的重點所在。

- 3.在定義方面：俄語諺語和成語在區別上有很大的爭議性，故在本論文裡採維諾格拉多夫和奧日科夫對成語狹義之看法為主的觀點來區分兩者，即認為諺語為完整句子，而成語則僅為一詞組。而俗語與諺語更有區別上的困難，因此將不對兩者進行區分。在漢語方面，採用楊欣安等人的觀點區別漢語諺語和成語的差異。而諺語和俗語的關係則採用溫端政的看法，即將兩者視為一體，不予以區隔。另外，俄漢語中演變為諺語的格言皆以各諺語詞典為根據，列入諺語詞典中的格言就視為諺語。
- 4.在單雙向對比方面：為使俄語特色能被清楚認識，本論文將採單向對比。第二章第三節探討諺語的定義、第三章俄漢諺語之來源及第四章俄漢諺語結構之對比採用單向對比，以找出俄漢語諺語的差異。第五章含動物詞彙俄漢諺語之文化意涵，因筆者為俄語研究者，故將以俄語為出發點，進行單向對比。
- 5.在內容－形式方面：第五章「含動物詞彙俄漢諺語之文化意涵」中，將從「內容到形式」，即「從文化到語言」。以同一種動物為研究基準，來探討俄、漢語中的文化內涵，以及如何體現在俄、漢語諺語的形式裡。
- 6.在形式－意義－分布方面：在本論文裡，著重探討語言和文化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在形式和意義的對比方面，更是本論文的重點所在。「形式－意義－分布」三者的關係中，「同一形式，不同意義」及「同一意義，不同形式」兩種關係將是本論文採取對比的主要方法，「同一形式，同一意義，不同分布」則次之。